

新中国与伊朗关系六十年

华黎明

内容提要 中国与伊朗历史上曾经有过密切的交往，这种交往给相互的文化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也是现代中伊关系重要的精神纽带。由于国际局势和双方国内政治发展的影响，新中国与伊朗之间的关系经历了一系列艰难和曲折。20世纪末以来，中伊双方高层领导人互访频繁，政治互信不断加深，经贸关系迅猛发展。在可预见的将来，中伊关系还会继续受石油和美国两大因素的影响。

关键词 中国外交 中伊关系 六十年 发展

作者简介 华黎明，中国前驻伊朗、阿拉伯联合酋长国、荷兰大使（北京 100022）。

中国与伊朗都是亚洲的文明古国，历史上曾经有过密切的交往。这种交往给相互的文化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也是现代中伊关系重要的精神纽带。今天的中伊关系对双方都是至关重要的，且备受国际社会的关注。回顾新中国与伊朗关系60年的历程是很有意义的。

新中国成立前的中伊关系

中国与伊朗关系二千多年的历史无不承载着时代的痕迹。史学家认为，伊朗对古代中国历史文化的贡献仅次于印度。

17世纪英国工业革命后，西方列强兴起，开始向东方殖民。中国和伊朗几乎同时成为西方殖民主义的猎物。在近代，中伊两国的命运相同，但是相互的关系却隔绝了数百年，形成中伊关系史的一段空白。

20世纪初，中国发生了辛亥革命，而在伊朗发生了立宪革命。两国的革命者遥相呼应，尤其是中国的革命者闻讯伊朗立宪革命的消息后备受鼓舞。立宪革命彻底动摇了伊朗恺加王朝的根基；辛亥革命则推翻了清王朝。中伊两国的历史几乎齐头并进。

1920年，刚刚在巴黎和会上遭到西方列强

羞辱的中国和摇摇欲坠的伊朗恺加王朝政府在罗马签订了《中波友好条约》，商定了互派大使、公使及代办等事项。但是，由于当时中伊两国都国力衰败，各自忙于内战及其与列强的关系，使条约徒具虚名，双方并无实质性的关系发展。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帮助中国抗日，两国是同盟国。1942年被盟军占领后，伊朗也被纳入美国盟国集团之中，美国向伊朗提供了价值4150万美元的食品和军火武器，并派遣财经和军事顾问团。1945年9月，伊朗在中国“陪都”重庆建立公使馆，但是，此事件几乎不能被视为两个主权国家的自主行为，更多只是同属同盟国的一个象征。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中国国民政府还都南京。1946年2月伊朗公使馆提升为大使馆，伊朗驻重庆公使赛义德·阿里·纳斯尔晋升为大使，并随国民政府迁至南京，直至1949年南京解放。

新中国前三十年的中伊关系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即与苏联结盟，并加入了社会主义阵营。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新中国与美国在朝鲜战场上直接较量，中美关系十

分敌对。美国不承认新中国，并阻止西方阵营中的任何国家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关系，对中国实施包围与封锁。

1949年，巴列维国王借口一次对他暗杀未遂事件取缔了伊朗人民党。1953年巴列维在石油国有化运动中被摩萨台领导的民族阵线推翻并一度流亡国外。他惧怕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和中苏结盟，对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自然采取了拒绝态度。美苏两大阵营的对立、意识形态的差异和利益权重的考量使新中国和伊朗彼此戒备，相互疑虑重重，也是这个时期中国与伊朗建立关系的主要障碍。

伊朗巴列维君主政权的对华政策具有鲜明的亲美反共色彩。从1949~1971年长达22年的时间里，伊朗拒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与台湾当局保持所谓“外交关系”，并互派“大使”；在历届联合国大会上均投票支持美国阻挠新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1950年，支持联合国关于朝鲜问题的决议，谴责中国为“侵略者”；1958年，巴列维“正式访问”台湾；1962年，中国与印度发生武装冲突时，伊朗在联合国支持敌视中国的“西藏提案”，谴责中国“侵略印度”。这个时期，中国与伊朗之间除少量贸易外，几乎没有任何交往。冷战将中伊两国又一次隔绝了22年。

20世纪60年代末，中国国内忙于“文化大革命”，在国际上，与苏联关系剑拔弩张，同时还在越南战场上与美国间接较量。由于美国尼克松政府寻求摆脱越南战争困境的出路，急需改善对华关系；而中国视来自苏联的威胁最为紧迫，于是出现了打开中美尘封了20年关系的契机。

1970年4月，伊朗最早捕捉到中美“乒乓外交”传递出的信息。1971年4月13日，巴列维国王派遣其孪生妹妹阿什拉芙公主访问中国，4月30日，巴列维的另一位妹妹法蒂玛公主也来访问。尽管当时中伊无外交关系，两位公主都受到中国热情隆重的接待，周恩来总理分别会见并宴请了她们。

1971年7月，基辛格访华，中美关系松动给国际关系带来了颠覆性的变化。曾经跟随美国而与中国无外交关系的国家集团迅速瓦解。伊朗

是跟进最快的国家之一。基辛格访华公报公布后不久，在巴基斯坦的斡旋下，中国与伊朗的代表就在伊斯兰堡开始了建交谈判。8月16日，中伊发表建交公报，双方“同意建立外交关系”，并“在尽可能短的期间内任命大使”。伊朗“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中国“坚决支持伊朗王国政府为维护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以及保护本国资源而进行的正义斗争”。建交后不久，两国高层开始交往。1971年10月，中国派特使、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郭沫若参加波斯帝国成立2500周年庆典（后因郭沫若在赴伊朗途中生病，由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张彤代表出席）。

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后，中国的外交政策逐步形成了联美抗苏的“一条线”战略，即推动东起美国西至西欧的国家结成制约和抗衡苏联的统一战线，伊朗位于这“一条线”的中间点，是重要环节，自然在当年的中国外交中占有重要地位。中伊建交后，两国关系迅速升温。1972年9月18日，伊朗法拉赫·巴列维王后在首相胡韦达陪同下应邀访华，董必武、周恩来等国家领导人会见了巴列维王后。周恩来总理亲自到机场迎接，并几乎全程陪同王后和首相的在华活动。

有两件事特别能说明伊朗在当年中国外交中所占的特殊地位。1966年“文革”开始后，中国外长停止了出访活动。1973年6月，中国外长姬鹏飞首次出访，访问国家的名单中有英国、法国、伊朗和巴基斯坦。1976年11月，中国人大代表团就访问了伊朗和科威特。这是中国粉碎“四人帮”后出国访问的第一个高级别代表团。

1973年6月30日，伊朗议会代表团访华。同年9月5日，巴列维的胞弟古拉姆·礼萨·巴列维亲王和夫人访华。1975年4月李先念副总理应邀访问伊朗。1975年5月阿什拉芙公主再次访华，病中的周恩来总理在医院会见了阿什拉芙公主。1976年7月，阿什拉芙公主第三次访华，还专程去了西藏。

1977年11月，中国人大副委员长邓颖超访问伊朗，伊朗给予邓颖超元首级的礼遇隆重接待，以弥补已故周恩来总理未了的访伊夙愿。巴

列维不仅亲自会见、宴请，还亲自为邓颖超副委员长驾车。

随着政治关系的不断深入，中伊两国经贸关系也取得了较好的发展。1974年9月中国贸易代表团访问伊朗。同年11月中国贸易代表团再次访问伊朗。1976年6月中伊联合贸易委员会在北京举行协商会议。1977年11月中伊联合贸易委员会在德黑兰举行第三次会议，签订了新的贸易协定，增加了许多新的出口产品。

1978年，伊朗爆发了全国规模的反巴列维运动。同年8月，当时的中国领导人华国锋在出访回国途中顺访了伊朗，受到在国内已处于四面楚歌的巴列维国王的隆重接待。事过不到半年，巴列维君主政权垮台，伊朗伊斯兰共和国诞生。此次访问被解读为“中国对巴列维的支持”，由此伊朗新政权的领导人和公众对中国有颇多怨词，双边关系严重受挫。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 的中伊关系

1979年中国开始实行改革开放，中美建交；同年，伊朗发生了伊斯兰革命。这两件事改变了冷战末期的国际格局，也改变了中伊关系。中国从封闭走向开放，并与美国建交。伊朗政治社会从高度西化转向宗教化、革命化，美国和伊朗结束了30年的结盟关系而走向敌对。中、伊两国的内政和外交几乎同时逆向而行。

处于改革开放初期的中国拨乱反正，对外重点解决困惑中国多年的中苏敌对关系和处理刚刚建立的中美关系，无暇顾及也不愿卷入中东事务。以当时自身的处境，中国也很难读懂伊朗的伊斯兰革命。伊朗方面，由于新政权刚建立，立足未稳，忙于内部斗争，加上伊朗公众对中国领导人在伊朗革命胜利前夕访伊的不满，导致中伊关系一度十分冷淡。

1979年11月4日，伊朗学生占领美国大使馆，将美国外交官扣押为人质。伊朗伊斯兰革命政权还宣称对外“输出革命”，国际形象欠佳。因此，当1980年9月21日两伊战争爆发时，国际社会多同情伊拉克，伊朗倍感孤立无援。而中国是当时世界上少数对战争保持中

立的国家。战争爆发后的第四天，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邓小平在会见挪威首相奥德瓦尔·努尔利时，对两伊之间的武装冲突表示了严重关切，同时希望这两个国家通过和平协商，解决相互间的争端，避免事态进一步扩大。1980年1月30日，美国向联合国安理会提出对伊朗实行经济制裁的决议草案，安理会15个成员国中，10个国家的代表投了赞成票；苏联和民主德国代表投票反对；墨西哥和孟加拉国代表弃权；中国代表没有参加投票。伊朗迅速对中国释放的善意作出了反应。两周后，伊朗现宗教领袖、时任议员的哈梅内伊以总理特别代表的名义访华“澄清国际事务立场”。1983年伊朗交通部长内贾特·侯赛尼扬和外长韦拉亚提先后访华，后者还会见了中国国家主席李先念等国家领导人。1984年中国外长吴学谦访问伊朗，分别会见了伊朗总统哈梅内伊和议长拉夫桑贾尼。两国关系从此解冻。

1985年2月，中国经济代表团访问伊朗。同年6月伊朗议长拉夫桑贾尼访华，受到元首级的高规格接待，拉夫桑贾尼在此次访问中首次会见了邓小平。

1988年7月8日，伊朗接受联合国安理会第598号决议，两伊战争结束。当年9月，中国人大委员长率团访问两伊。1989年5月，哈梅内伊以总统身份访华，也在北京会见了邓小平。

1989年6月4日，在北京发生政治风波的同日，伊朗领袖霍梅尼逝世。中国遭遇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的集体制裁。1991年，柏林墙倒塌及苏联瓦解后，西方对中国施加了更强大的外交、经济和贸易压力；伊朗在霍梅尼后实现了权力的平稳交接和过渡，同时在国际上继续处于孤立的处境。这一时期，中伊两国在“反对霸权主义”问题上相互同情、相互支持。1991年7月和10月，中国国务院总理李鹏和国家主席杨尚昆相继访问伊朗，当年11月，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鲁比访华，双方高层互访频繁。1992年，美国宣布向台湾出售F-16军用飞机后，中国在北京高调接待了伊朗总统拉夫桑贾尼。

伊朗在人权、台湾等问题上给中国以宝贵的支持，中国也尊重伊朗人民的选择，在伊朗遭遇

国际孤立时与其保持了正常的友好交往。两国的政治关系再度升温。继 1992 年拉夫桑贾尼总统访华后, 双方高层互访不断。从 1996 年 ~ 2002 年, 胡锦涛副主席、江泽民主席等多位中国高层领导人先后访问伊朗。

高层互访有力地推动了两国关系的健康发展。特别是哈塔米总统访华和江泽民主席访伊, 对中伊关系发展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中伊两国政府签署了一系列重要协定和协议, 如《中伊文化和科学技术合作协定》《中伊两国广播电视合作计划》《中伊关于互设总领事馆协议》《中伊政府关于互免签证的备忘录》《中伊政府贸易协定》《中伊两国外交部建立磋商机制谅解备忘录》《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伊朗伊斯兰共和国联合公报》《避免双重征税协定》《海运协定》《中伊政府原油长期贸易协定》和《中伊政府关于在石油领域开展合作的框架协议》等, 这些文件的签署, 成为中伊友好合作发展的重要基础。

与中国和伊朗良好的政治关系相比, 两国的经贸关系一度严重滞后。伊朗遭到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制裁, 需从中国进口大量商品, 而中国在 20 世纪 80 年代还是石油出口国, 从伊朗进口的少量原油也都转口到第三国。当时的伊朗正处在两伊战争之中, 外汇严重短缺。因此, 中伊双边贸易中方大量顺差。双边贸易额长期徘徊在 1 亿 ~ 2 亿美元左右。

1992 年, 邓小平南巡讲话后, 中国经济高速发展, 首次遭遇能源短缺。自 1993 年起, 中国由石油出口国转变为石油净进口国。伊朗表示愿以原油代替现汇支付从中国进口的商品。这本是两国经济互补双赢的最佳出路。但是, 一个技

术问题却成了中国进口伊朗原油的障碍。当时中国的绝大多数炼油厂只能炼制中国自产的低硫油, 消化不了伊朗的高硫油, 要解决这个问题, 中国的炼油厂必须增建脱硫装置, 需要大量投资, 更需要时间。所以, 直至 1995 年, 双边贸易额未超过 4 亿美元。1997 年后, 中国国内带脱硫装置的炼油厂如雨后春笋般建起, 伊朗的原油滚滚流入中国市场。中国的机电产品和成套设备源源不断输入伊朗。

进入 21 世纪, 中国经济高速发展, 对能源需求猛增。2000 ~ 2002 年, 中国进口伊朗石油分别为 700 万吨、1 085 万吨和 1 110.7 万吨, 在中国进口石油总值中分别占 10%、18% 和 15.16%。2001 年, 伊朗曾超过阿曼成为中国石油进口的第一大来源国。如今, 伊朗每年向中国出口原油 2 700 万吨, 成为中国第三大能源供应国。近年来, 中国的三大石油巨头——中海油、中石油和中石化都与伊朗方面就石油天然气开发进行了密切合作。

1979 年伊朗伊斯兰革命后, 美国因素常常成为中伊关系中的一个重要障碍。由于美伊敌对, 伊朗问题成为中美关系中的一个重要议题。尤其是在中国对伊朗能源供应依赖度大幅增加和 2003 年伊朗核问题浮出水面后, 这一矛盾尤为突出。美国要求中国在对付伊朗方面与美国保持一致, 而伊朗作为中国能源供应的大国又期待在受到美国压力时得到中国的支持。在可以预见的将来, 中国与伊朗的关系还会继续受石油和美国两大因素的影响。

(责任编辑: 詹世明 责任校对: 赵 苹)